

SU WENXUE

俄 苏 文 学

9

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苏文学研究室

目 录

评 论	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 王继思 (1) 中俄文学起源之比较 关引光 (28) 读果戈里的《狄康卡近乡夜话》 (青年习作)李一新 (39)
文艺理论与文学史资料	批判现实主义 (续) C·彼得罗夫 胡杨译 (48) 无家可归的播种者, 热情洋溢的人 ——评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 Г·比亚雷 周如心译 (64)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不同的日子里 (日记摘抄) H·戈尔顿 李之基译 (86)
中 篇 小 说	陌生人 (续) B·利帕托夫 周振美译 (103) 情 节 C·巴巴耶夫斯基 李言学译 (152)

短篇小说	A·沙夫库塔短篇小说两篇 孔见译 (252) 科利亚 我不理解他..... 会 诊 K·科别里泽 丛亚平译 (277)
诗歌	横渡长江 K·西蒙诺夫 柱石译 (293) 当同志呼唤的时候 C·福格利松 素心译 (299) 后妈 И·塔季娅妮切娃 素心译 (300) 两个儿子 И·塔季娅妮切娃 素心译 (301)

(内部刊物)

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

王 继 思

正如列宁所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干些糊涂事，空忙一阵，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无产阶级文化派所扮演的正是这么一种角色。

一九一〇年，列宁在《政论家的短评》一文中曾经指出：“在目前时期，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已经居于首要地位。”^①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实际上是这种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系列错误主张的深刻批判，是苏维埃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国界，对当今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总演习”以后，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他们在磨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准备迎接未来的战斗的同时，迫切希望能学到文化知识，以便逐

渐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于是一个学政治、学科学文化的热潮在工人们中间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与社会主义”等一些基层文化教育组织相继建立。一九一七年九月，各文化教育组织的代表在彼得格勒开会，正式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协会宣布为独立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以在工人中间开展文化教育和教学为目的，不受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领导。

十月革命以后，许多工人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纷纷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使协会得到迅速发展，会员人数激增，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分会很快遍布全国各个省城、区中心和工厂，最多时达到一千三百八十多个，会员多达四十余万人，还创办了学校、工人文化宫、文学讲习所、俱乐部及各种文化艺术的艺术组织，出版《无产阶级文化》、《未来》、《熔炉》、《汽笛》、《创作》等二十多种定期刊物，并掌握着几家出版社。协会在普及文化知识、进行启蒙教育和培养工人文化骨干等方面曾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维埃文化的发展，这是必须加以充分肯定的。可是，由于协会的领导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依然坚持要“独立”于政权机关之外，于是许多反动的知识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涌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试图以这个合法存在的文化组织为阵地来兜售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工人文化水平低，政治上尚不完全成熟，这些敌对分子往往就成了当然的领导人。一九二〇年《俄共中央的信》曾经指出过这种情况：“未来主义者、颓废派分子、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拥护者，以及普通的失意者、资产阶级评论界和哲学界出身的人，开始在某些地方掌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事务。”②从一九一

八年起，列别杰夫一波梁斯基和瓦·普列特尼奥夫先后担任协会主席，亚·鲍格丹诺夫成了协会的中央委员，实际上是主要理论家。他们打着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号，顽固地要求脱离党和苏维埃政权而“独立”，大搞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宣扬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通常并不是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组织本身，更不是指协会的所有成员，而是指混入协会、夺取了协会领导权并推行“无产阶级文化”纲领的鲍格丹诺夫、列别杰夫一波梁斯基和普列特尼奥夫等少数人。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群众组织是支持的。据费·沃尔金回忆，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底接见协会的代表时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不是坏事。我们的工人写自己的剧本，写诗，出版杂志和书籍，在自己的俱乐部舞台上演出，用各种艺术形式来显示自己的创造力，并从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很好。然而不好的是，有人企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组织偷运异己的思想来影响我们。”^⑨很明显，列宁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对协会影响很大的鲍格丹诺夫之流。

鲍格丹诺夫是俄国马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早年曾加入过布尔什维克派，一度当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参加过一九〇四年同孟什维克的文学辩论，筹备出版过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过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甚至还主持过党的军备小组。但由于他在哲学上坚持马赫主义，在对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的看法上与布尔什维克有着原则的分歧，他很快就同党分道扬镳，组织起“前进派”反党集团，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二月革命以后，他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和小册子，断言布尔什维克不参加临时政府是错误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的提法不妥，工农联盟难以持久等。就是这么一个人物，竟把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领袖”。

鲍格丹诺夫从一九〇九年 起就开始 鼓吹“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哲学”，然而这不过是些马赫主义的代名词，是用各种各样的伪装来掩饰的哲学唯心主义。他认为一切旧文化及其传播者知识分子都是危险的，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不良影响。他甚至不承认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认为高尔基笔下所反映的是“小市民”和“流浪汉”的心理。在鲍格丹诺夫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只能在他的“组织科学”的理论指导下产生。依照这种“理论”，文化和艺术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只是用“生动的形象”去组织人们的“社会经验”。过去的文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经验”，“无产阶级文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的反映。而无产阶级同以往的一切阶级都是根本对立的，因而“无产阶级文化”和过去的文化就毫无共同之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只能在排除一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的环境中加以创建。鲍格丹诺夫的这套马赫主义的反动谬论成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精神支柱和一切错误的理论依据。

在鲍格丹诺夫的反动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一系列的错误主张。首先，他们试图摆脱党的领导，实现协会的“独立自主”。十月革命以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独立存在，不受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的领导，是有革命意义的，然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并成立了附有无产阶级文化司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无产阶级文化派还闹独立，这就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反动的了。鲍格丹诺夫曾经发

出号召：“工人阶级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创造他们所缺乏的东西。文化独立要成为他们当前的口号，而今后则要成为他们经常的口号。”^④他还说：“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是历史向我们工人阶级提出的最后要求。”^⑤协会主席列别杰夫一波梁斯基也说：“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无产阶级充分发挥独立性，不受政府颁布的任何法令影响的条件下才能够发展。”^⑥他们强调艺术应“独立”于政治与阶级斗争之外，说什么无产阶级艺术是真正的艺术，它“不应受任何任务或目的约束”。于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走上了一条与党和苏维埃政权分庭抗礼的道路。为了给自己的独立自主制造借口，他们提出了一种“平等”的理论，说什么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和创作的阶级组织。因此，党只能领导政治斗争，工会只能领导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则应由他们无产阶级文化派来领导。他们还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是苏维埃政权机关，而苏维埃政权是工农联盟，要关心所有的阶级，所传播的是“资产阶级文化”，所以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单纯是无产阶级的机构。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则不然，他们要同一切非无产阶级分子断绝往来，独树一帜，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至于说他们“只承担在无产阶级中间开展文化创作的任务”，那只是文化领域里的“职能分配和分工”。因此，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不能领导他们的。说到底，他们实际上就是要反对党来领导文化建设，妄图摆脱党的领导，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独占文化领域。

依照鲍格丹诺夫的理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就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加以组织，也就是把不包含任何别的“阶级混杂物”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表现出来。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部分优秀分子，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特殊的实验室里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教育人民委员部无法胜任，因为它不是“纯无产阶级的”，要和各个阶级打交道，尽管它有着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真诚愿望，但“由于客观的和暂时无法克服的条件”，面对圣洁的“无产阶级文化”，它只能望洋兴叹。知识分子受的是旧教育，带有剥削阶级的深刻影响，是危害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最可怕的因素，必须严加防范。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同革命是格格不入的”，不可能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化”。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派敌视知识分子，蔑视农民，明确宣布不与苏维埃政权知识分子和农民合作。对叶赛宁等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一九一八年提出的关于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农民分会的倡议，他们也丝毫不予理睬。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当此重任，才能把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最完美最迅速地完成”，使暂时脆弱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幼芽茁壮成长，“以纯洁的形式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文化派还认为，创造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的，只消设计一个“现成的模式”，然后在动劳人民中加以推广就行了。所谓“现成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就是“纯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就是“纯无产阶级的独创性和阶级本质”。实际上，在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中，“阶级性”完全排除了人民性，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派主义。

对待过去的文化遗产，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一脉相承，都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早在一九一二年，未来派就提出要把普希金、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切古典文

学作家都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下去”，把那些旧的艺术形式统统“撕毁、粉碎，从地球上消灭干净”。无产阶级文化派从鲍格丹诺夫的“组织经验”的理论出发，对旧文化也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他们的理论家比萨利科一九一八年曾在《未来》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什么新的创作和旧的创作之间，继承的联系是不必要的，苏联读者不需要托尔斯泰和其他古典作家的小说，他们的小说也永远不会再版。协会主席列别杰夫一波梁斯基也在一九一八年发表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孕育在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它彻底根除资产阶级的遗产，无产阶级要用自己革命创作的热情推翻和消灭旧世界的一切图腾和真理。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彼得格勒分会负责人基里洛夫的诗《我们》，则更加露骨地表明了他们的虚无主义观点。诗中写道：“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砸烂博物馆，踏碎一切艺术的花朵。”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热烈欢迎革命新事物，主张摧毁旧文化，是苏联国内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是工农大众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表现。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漂亮口号掩饰下，推波助澜，大肆散布虚无主义观点，对当时苏联刚刚开始的文化建设实在危害匪浅。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派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就必然不关心政治，追求无思想性的艺术。由于他们排斥其他一切阶级，躲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实验室里，努力表现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本能”，脱离人民，脱离生活，脱离实际斗争，也脱离本阶级的广大工人群众，这样就必然走入歧途，向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举手投降。他们只能闭门造车，胡乱编造出一些纯理性的、抽象的、枯燥乏味的、不伦不类的东西。比如，他们

要求表现“集体主义”，要求用“我们”的字样写作（而不用“我”，那样就不是无产阶级），主张赞美机器，描写“机器主义”的心理，认为工人在服从机器的节奏和速度的时候，就会失去任何个性，而变成无言、无意识的自动机器。这种非人化、非个性化的作品，工农群众当然是无法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创作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不可能创作出真实感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来，只能把艺术引入绝境。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派自有高论，那个声言要“烧掉拉斐尔”的基里洛夫就曾说过：“作品不易懂，广大群众不能理解，这并不是坏事。力求通俗与其说是诗人的优点，不如说是他的缺点。”^①这些人还不如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连黑格尔都认为：“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的听众……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教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民族的人民大众。”^②因为在马赫主义者看来，艺术并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组织经验”的手段。他们的所谓“经验”，不是别的，就是与客观现实毫无联系的主观感觉。所以基里洛夫的这些话不仅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实质，而且说明他们所坚持的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

二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演说里，在致一些同志的书简和个别交谈中，都曾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

作过无情的批判。他明确指出，鲍格丹诺夫等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钻进新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并把这种组织看成传播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点的最好场所，这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主要错误的阶级根源。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摆脱这些敌对分子的影响，走出与世隔绝的实验室，参加到亿万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为苏维埃文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列宁曾作过不懈的努力。

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党的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必须由党来领导，而不能由无产阶级文化派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都“应该公开承认党的政治领导”。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文学艺术的党性思想，是列宁所一贯坚持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一九〇五年，列宁针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是苏联文化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齿轮和螺丝钉”，严厉地批评了那种要求“创作的绝对自由”，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明确指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要求党员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到党的一个组织中去。对于违反党性原则，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文学家，党组织应当采取组织措施，把他们从党内清除出去。出版社、报社、图书馆等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应当向党汇报工作。列宁还要求工人中的党员群众注视和监督这一切工作。

后来，列宁又多次谈到党性问题，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

“出版自由”、“纯粹民主”的口号，提出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

在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所谓“平等”的理论，妄图脱离党的领导而实现“独立自主”的那些年代，列宁在一系列的讲话和文稿里，曾多次强调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对鲍格丹诺夫之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〇年八月，列宁曾专门向副教育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了解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法律地位及其领导核心的情况，还问到领导成员是谁委任的，是否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地位、作用和工作总结的重要文件。后来，他又特别询问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监督是如何实现的。可见，列宁对协会的 leadership 问题是极为重视的。然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并没有把列宁的指示放在心上。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就曾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对顿河罗斯托夫的下属单位发出过指示，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工人阶级完全独立的文化教育团体，就其任务而言，它是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建树之一，地方政权应对它加以特殊的保护，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它的活动，而应在各方面给予资助。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曾委托卢那察尔斯基在大会上发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应当作为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并向它报告工作。可是，卢那察尔斯基当时并没有照列宁的指示办。他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大会上表现的独立倾向，不仅没有进行批评斗争，相反却表示支持，说“应当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享有特殊的地位，最充分的自治。”^⑥列宁得知以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并火速起草了《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提交俄

共中央讨论，然后再拿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作为该协会的决议。

《论无产阶级文化》是苏维埃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列宁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文化艺术教育同整个教育事业一样，必须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国民教育的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妄图摆脱党而独立存在的错误，列宁特别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⑩从形式上看，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通过，但无产阶级文化派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在此之前，他们就曾要求党中央复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问题，并曾派出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上访，求见列宁，坚决要求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列宁耐心地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明确表示，党不仅要领导政治，而且要领导经济和文化。

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十一日，十四日和十一月十日，列宁曾主持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从十月九日的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出，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之外，还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代表。会议听取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意见。他们仍继续坚持错误的观点。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分析批判。列宁和斯大林都曾经先后九次发言。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派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在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在列宁的指示并亲自参与下，俄共中

央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即《俄共中央的信》),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一个司级机构,合并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归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并以俄共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令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协会的领导。

当然,协会领导人,其中包括出席协会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思想上是有抵触情绪的,认为这种合并“为时过早”,坚决请求暂时不要合并,有的甚至肆无忌惮地要求中央撤消这一决定。

列宁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但他并没有忘记文化艺术有自己的特殊性,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应当同在其他领域的领导有所不同。一九〇五年,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就曾经提到:“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①列宁在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中,一方面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由党来领导,态度坚决,寸步不让;另一方面也注意给予协会的创作活动以充分的自由。在列宁主持起草的那封著名的《俄共中央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中央不仅不想束缚工人知识分子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动精神,相反,中央想给他们创造更健康的、更正常的环境,使他们在整个文艺创作上卓有成效的表现出来。并指示教育人民委员部“创造和维护确保无产者有可能在他们的机关里进行自由创作的条件”。还责成各省委注意,不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搞烦琐的监督。

在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独立主义倾向,努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的同时,列宁对他们排斥广大

劳动群众，脱离现实，宣扬与世隔绝，由少数人臆造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也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列宁一贯认为，文化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任何排斥劳动群众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列宁曾写信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会议主席团，指出必须把所有的劳动群众都团结在城市工人的周围，与他们结成最牢固的联盟，并把吸引劳动群众参加国家建设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这是获得进一步的成就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劳动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离开了劳动人民，离开了他们的社会实践，任何创造文化的说法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此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也不是搞阶级的特殊化，只关心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试图使无产阶级永世长存，而是必须“把被资本主义折磨、压迫和分散的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都紧紧地团结起来，为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与鲍格丹诺夫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相反，列宁历来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一九〇八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列宁曾经对鲍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观点进行过有力的批判，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不过是对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因此，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贺词和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报告中，都曾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过严厉的批判，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用最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某种新东西，并在纯粹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

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他明确表示：“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②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一九二〇年，当发现鲍格丹诺夫的反动观点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时，列宁决定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专门加了一个序言，指出“鲍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③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只能在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因为这种文化不同于旧文化，它担负着崭新的历史使命，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和“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它还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教育人和培养人。所以，这种文化，不论是文学和艺术，都应是对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真实反映，应当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高度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无疑，这样的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相反，无产阶级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才能写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好作品。列宁非常关心作家同工农群众的联系，曾教导他们要“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些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④要求他们“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⑤列宁还提出要“不倦地重复这个口号”。对那些脱离工农，误入迷途，变得消沉悲观、牢骚满腹的作家，列宁就及时地给以中肯的批评，热情的帮助。众所周知，一